

过于正确的卡列宁

闫红

虽说不能以貌取人，但看一个好看的人受苦，常常会让人本能地生出更多的恻隐之心。英国版《安娜·卡列尼娜》里卡列宁是大帅哥裘德·洛演的，窈窕倩影看完电影去找原著，他以前老听人说托尔斯泰是同情安娜的，如果安娜是受害者，那施害者就是可恶的卡列宁，可这人好像还可以啊。

他的这种困惑我也有，我看的是小说，译者序言说卡列宁这个人“虚伪冷酷，醉心仕途，是个十足的做官机器”。我越看越不对，连“受害者”安娜都屡次表示，卡列宁是个好人。

第一次是安娜刚遭遇伏伦斯基的热烈表白后，她灵魂经历巨大的冲击，再看卡列宁，哪里都不对了，连耳朵都很奇怪。

安娜被自己的想法吓住了，对自己说：“他是个好人，正直，善良，事业上有成就。”她要为不分的感情设个篱笆，不过这时他们已经结婚八年，卡列宁要是为人很差劲，她也没法昧着良心这么。

两人最终还是决裂，安娜和伏伦斯基私奔，谈到卡列宁时，安娜仍然说：“我明明知道他是一个不多见的正派人，我抵不上他的一个小指头，可我还是恨他。我恨恨他的宽宏大量。”

没有比已经反目的前任的肯定，更加靠得住了的话。但从这句话里也可以看得出，正派和宽宏大量并没有让卡列宁变得讨人喜欢，而是正相反。不能说美德有问题，卡列宁的问题在于，他的美德是教条的，刻板的，过度的。

当年他和安娜结婚，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好人。卡列宁当上省长时临近四十，还没有结婚。当地一位有钱的贵妇人，把她十六岁的侄女安娜介绍给他这个“就年龄来说并不年轻，但就做省长来说却很年轻的人”。

安娜了解卡列宁，她知道“艺术对他的天性是格格不入的，但卡列宁从不放过艺术界发生的任何重大问题，并且认为博览群书是他的责任……在艺术和诗歌方面，尤其在音乐方面，尽管他一窍不通，却总是他明确而坚定的见解。他爱莎士比亚、拉斐尔、贝多芬，爱谈新派诗歌和音乐的意义，而他对于各种文艺流派都做了十分明确的分类”。

对于这桩婚事，一开始卡列宁是拒绝的。书中说，这弄得他的处境十分为难：要么向她求婚，要么离开这个地方。听起来他好像不喜欢安娜，或是遇到很大的阻碍。事实上这两点都不存在，安娜是个大美人，伏伦斯基对她一见倾心，本来对她不反感列文只是看到她的画像，就被她生机勃勃的美震撼。卡列宁也喜欢安娜，可是和她结婚，是“正确”的吗？

这么吧，卡列宁有一种好学生的积习，不管这个功课他是否感兴趣，他都会要求自己拿高分，认为这是自己的责任。但安娜生机勃勃，富有激情，而激情本身，就带有那么一点不正确。

最终是安娜的姑姑用魔法打败魔法。姑姑跟卡列宁说既然他已影响到姑娘的名誉，他要是有责任心，就该向她求婚。

伏伦斯基对她的爱就是不正确的，我怀疑这种“不正确”比伏伦斯基本人更吸引她。她嘴上说着拒绝，身体却很



诚实，等到人人都注意到他们不正常时，卡列宁也终于注意到了。卡列宁是个没什么体感的人，如果他开车，他一定是那种看到别人开雨刮，他才打开雨刮的那种人。发现安娜出轨，他感受到的不是失去，而是混乱。

他罗列了一二三四点和安娜谈，从舆论面子到宗教到个人得失，如此严肃，对于已经很上头的安娜只是雪上加霜，她觉得他这个人很好笑。卡列宁只好定出新规矩，她在外面玩不可以，不要把情人带回家，他可以假装不知道。

高尚让安娜自惭形秽，耻于再提离婚二字。一时间卡列宁的道德光芒照耀了世界，让每个人都想像他一样，做最正确的那个人。可惜，被感召而不是内心生长出来的“正确”是间歇性的，安娜终究敌不过内心的渴望，和伏伦斯基私奔了。

这是最坏的局面，比离婚还要坏。卡列宁近乎反人性的宽容，却让自己变成一个天大的笑话，他感觉被谁骗了，自问：“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精神困境外加外界的欺凌嘲讽，让濒临绝境的卡列宁把唯一支持他的老友李迪雅夫人当成依靠。李迪雅夫人痛恨安娜，当安娜托哥哥请求卡列宁离婚时，她让卡列宁不要答应。

接下来的事我们都知道了，无法离婚的安娜，日渐感觉伏伦斯基爱意已尽，她疑神疑鬼，出现幻觉，最终卧轨自尽。伏伦斯基惊痛之下，远赴战场，最后还是李迪雅夫人托人介绍他人入伍的。而卡列宁，收养了他们的女儿……伏伦斯基的母亲说：“她使他自由了。”

的确，安娜之死几乎解决了卡列宁的所有问题。他不会再次被嘲笑，被影响，更重要的是，他可以踏踏实实心无旁骛地做个好人了。他本来就是个孤儿，现在所有能影响到他的炽热感情都已经不在，他可以彻底像个AI那样看似具体实际抽象地活着。小说后来都不再写他，大概知道他的生活会很和谐。

不能不说卡列宁是一个好人，但他的道德，是要消灭所有的血肉才能存在，我们是否可以说，他有一种“正确专制”呢？

找个文学人物来类比，他有点像中国的法海，他们务求正确，没有容错率，像个程序那样运行着。可是人类本身，常常荒唐走板。不容许这一切发生的他们，就变成施暴者的角色。

伟大作品里没有绝对的好人和坏人，把人分了黑白，也就和寻常正常的大多数划清界限，让人无所汲汲。伟大作品里有的是某一种类型的人，有着人人都可能有的局限性，犯着大多数人都不会犯的错。

像卡列宁或法海这样的人固然是人群里的少数，但扪心自问，我们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时刻？陷入“正确洁癖”而不计其累。我承认，我有时会有，我会用卡列宁式的尖嗓子，在心里批评自己和他人，对自己的“不正确”尤其不肯原谅。

我把卡列宁上身的那一刻取名为“卡列宁时刻”。据说，将某个习惯命名，就可以避免总是陷入其中。我希望，这个说法是真的。

英国影片《安娜·卡列尼娜》(2012)剧照，裘德·洛饰卡列宁，凯拉·奈特莉饰安娜·卡列尼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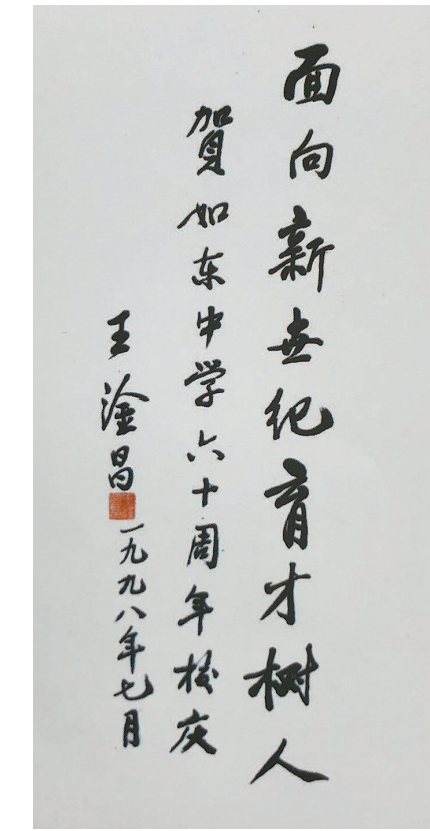
提示，很容易发现另一位李苦李：李问渠(1884—1967)，号苦李，江苏铜山(今徐州铜山区)人，早年仕官米陕，久则落魄西安，正是黄永年先生三十多岁后就终身居止的城市。所谓“长安居，大不易”，正契“居易堂”。李问渠富收藏，尤好宋元旧槧和明清闻人手札等。1930年曾经历火厄，绝大部分藏品付之一炬，此后重新搜集，渐有规模。据云，四十年前一度盛传他的故宅将要拆迁，后人遂惶惶出其所藏，大多数入西安文物商店。陕西省图书馆如今藏有他旧藏的明万历四色套印本《苏长公合作》八卷、清康熙三年刻本《牧斋有学集》五十卷、乾隆武威殿聚珍本《耻堂存稿》八卷，均有其题跋，《耻堂存稿》甚至连题三则，确是收藏家复古爱书的姿态。

第三本书《无尽的追问——大科学家讲的小故事》，应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之约，1997年12月出版。其中谈道：“1969年初，党中央决定在国庆20周年大庆之前，进行我国第一次地下核试验。……第一次地下核试验的任务就落到我的身上。”“由于‘文化大革命’，我国的地下核试验中断了一段时间，一直到1975年才进行第二次地下核试验，1976年

提示，很容易发现另一位李苦李：李问渠(1884—1967)，号苦李，江苏铜山(今徐州铜山区)人，早年仕官米陕，久则落魄西安，正是黄永年先生三十多岁后就终身居止的城市。所谓“长安居，大不易”，正契“居易堂”。李问渠富收藏，尤好宋元旧槧和明清闻人手札等。1930年曾经历火厄，绝大部分藏品付之一炬，此后重新搜集，渐有规模。据云，四十年前一度盛传他的故宅将要拆迁，后人遂惶惶出其所藏，大多数入西安文物商店。陕西省图书馆如今藏有他旧藏的明万历四色套印本《苏长公合作》八卷、清康熙三年刻本《牧斋有学集》五十卷、乾隆武威殿聚珍本《耻堂存稿》八卷，均有其题跋，《耻堂存稿》甚至连题三则，确是收藏家复古爱书的姿态。

王淦昌教授是一位德高望重、科学成就突出的核物理学家。他热爱祖国、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无私奉献的高尚品德和谦虚朴实、坦率真诚、清正廉洁的工作作风，值得广大科技工作者很好地学习。他对核物理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也是我国核武器研制的主要奠基人之一，还是最早在我国介绍活动站的科学家。他学识渊博，思想活跃，治学严谨，善于学习新知识始终站在科研前沿，具有不可多得的杰出科学家的优秀品质。

第三本书《无尽的追问——大科学家讲的小故事》，应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之约，1997年12月出版。其中谈道：“1969年初，党中央决定在国庆20周年大庆之前，进行我国第一次地下核试验。……第一次地下核试验的任务就落到我的身上。”“由于‘文化大革命’，我国的地下核试验中断了一段时间，一直到1975年才进行第二次地下核试验，1976年



今年12月10日是“两弹一星”元勋王淦昌院士逝世26周年，谨以此短文表达小辈的怀念之情。

王淦昌先生是我岳父施士元的同窗挚友。他常说：“我比你丈老人年长大半岁。”我和妻子施蕴隆历来称呼他王伯。

王伯生于1907年5月28日，我的岳父生于1908年3月20日，他们是上海浦东中学的同学，1925年二人同时考进清华大学物理系。这是清华大学物理系第一届，共有四名同学，我们认识的还有一位是后来长期在复旦大学任教的高尚人品和卓越成就之后，第一次见面是在“文革”结束之后，岳父来北京开会的时候。王伯居住在木樨地22楼，与我们家一河相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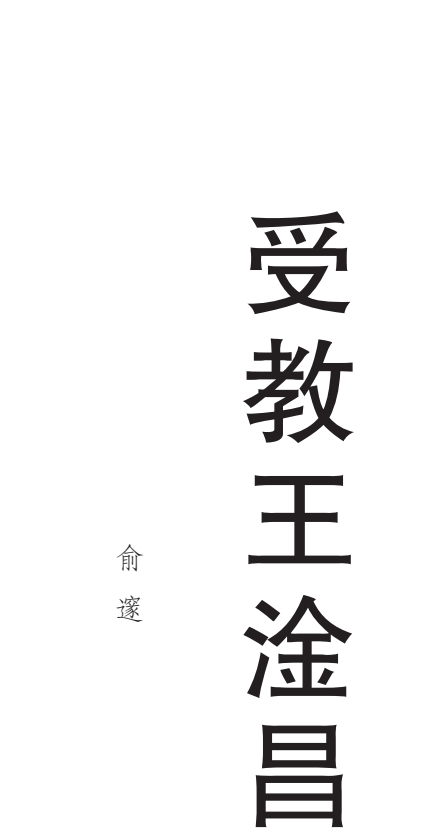
王伯先后赠送我们三本书并题字。第一本书《王淦昌和他的科学贡献》，是科学出版社1987年7月出版，学界祝贺他80寿辰的一本文集。以数学家苏步青教授的祝贺开篇，物理学家周培源教授作序，作者包括几乎所有最著名的物理学家，其中有杨振宁、李政道、钱三强、钱临照、周光召、程开甲等50多人。我是从岳父撰写的这篇祝寿文章中，开始比较全面认识王伯的。文章题为“从核物理黄金时代谈起——为祝贺王淦昌八十寿辰而作”，涉及专业的内容我一点不懂，但可以领略王伯崇高的精神境界。文中写道：

“西马反超跑室前，国际风云路八千；投身核弹研制中，沐阳山沟几十年。”科学大会以后，各专门学会相继活动起来，尤其是中国核学会成立后，我看到阔别多年的王淦昌，其姿态、风度、语言语调依然如故。……王淦昌很健康，气色很好，心平气和。这和他开朗的性格、乐观的情绪有关。几年前他当副部长辞掉了，只领导一个科研小组，搞惯性约束，也许带几个研究生。同时，把核物理学会理事长职务也辞掉了。他说：“别人可担任的工作何必自己一直担任下去呢？”王淦昌很受学生的敬仰。人人喜欢他不仅在其学术上的成就，而且在其为人。他的处世为人之道，使人们对他人都有好感。这些美好的事物都将在人们的心中永存。也许有人以为王淦昌几十年来一帆风顺。有点儿像苏轼的词中描写周瑜那样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轻而易举地大破曹操八十万大军。其实科技工作每走一步都是作用与反作用的结合。失败是成功之母。几十年来他日日夜夜克服了无数艰难险阻，才登上一个又一个高峰。惟其难能，因此可贵。际此寿辰，千里之外，高举美酒，敬祝一杯。

第二次书《核物理学家王淦昌》，是几位作者编写的一部传记，1996年原子能出版社出版。该书共十三章，加上年谱，近30万字，朴实、深刻、生动地叙述了王伯光辉的一生。周光召教授的序和编著者的后记，对王伯的成就和品德都有精当的概括。序言中称：

王淦昌教授是一位德高望重、科学成就突出的核物理学家。他热爱祖国、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无私奉献的高尚品德和谦虚朴实、坦率真诚、清正廉洁的工作作风，值得广大科技工作者很好地学习。他对核物理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也是我国核武器研制的主要奠基人之一，还是最早在我国介绍活动站的科学家。他学识渊博，思想活跃，治学严谨，善于学习新知识始终站在科研前沿，具有不可多得的杰出科学家的优秀品质。

第三本书《无尽的追问——大科学家讲的小故事》，应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之约，1997年12月出版。其中谈道：“1969年初，党中央决定在国庆20周年大庆之前，进行我国第一次地下核试验。……第一次地下核试验的任务就落到我的身上。”“由于‘文化大革命’，我国的地下核试验中断了一段时间，一直到1975年才进行第二次地下核试验，1976年



俞邃

王伯在后记中留下一番极其感人的话：“我这个人很平常”，“我没有值得夸耀的”，“我的缺点很多”，“希望青少年朋友们以我为鉴，做比我更多的工作，做得比我更好。最后，我送你们三句话：知识在于积累，才智在于勤奋，成功在于信心。”

自从认识王伯之后，我成了岳父与他之间的联系人，所以接触比较频繁。王伯在给岳父的信中，多次提及我在这两方面发挥的作用，甚至得到他的称赞。1989年9月13日他在给我岳父的信中说：“令婿俞邃同志为为人最好，经常有联系，关于你的情况，都是我告他的。我很感谢他。”真是让我受宠若惊！

我们多次去看望王伯，可是一直没有抓住机会与王伯合影留念。八十年代末的一个春节，我和蕴隆去看望，与王伯和吴月琴伯母有过一合合影。那时他家中无别人，我们也不会用照相机自拍，于是只能分开两次拍摄。可惜那天室内光线较差，照相机又不先进，照片不太清晰。但极其宝贵，我们一直珍藏着。

1998年，我的母校江苏省如东高级中学六十周年校庆，校领导托我请人题词。我想，学校是从事教育事业的，请著名专家学者题写可能更合适。于是我请到了六位在各界有代表性的著名人物：物理学家王淦昌，经济学家刘光远，诗人臧克家，历史学家刘大年，原文化部部长、时任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主任刘忠德，中国第一位乒乓球世界冠军也是第一位世界冠军邱钟惠。

我去请王伯题词时，一心想的是一位大科学家，对教育事业非常关注，为人也特别善良，相信他一定会给予支持。同时，我也担心老人家高龄，近来身体欠佳，会不会有什么不便之处。1998年7月的一天，我去王伯家。说明来意后，他毫不犹豫，立即让他的儿子铺开笔墨纸砚，兴致勃勃地挥毫命笔。

我第一次见到王伯的毛笔字，是那样挺拔而又清秀。他写成“面向新世纪育才树人”——贺如东中学六十周年校庆”二十大字，发现有一个字被墨汁染脏，欣然又重写了一遍。同年12月，王伯辞世，此件成为绝笔。

在我与王伯接触过程中，他很少谈及他的健康状况。1986年5月我去驻苏联使馆工作，王伯特意来家中看望，赠给我一支派克笔，一本俄汉词典。那时他的身体和精神都很好。记得从我所住大院走出门时，遇见我所任单位的领导、谷超豪院士的哥哥谷力虹同志。王伯与谷超豪院士熟悉，我介绍之后，他们互致问候。王伯回头说了一句：哥哥比弟弟消瘦。随后我陪他到城门花园看了看，他不觉得意，表示有兴趣以后由我陪同再去走走。

1990年秋的一天，我去王伯家，他告诉我苏联科学院邀请我去访问。唯恐他有不便之处，我请他的秘书带我去给当时驻苏使馆张震公使的信，请予关照。王伯未拒绝，但他还是没有给使馆添麻烦。

后来王伯病重，未能就近住进一墙之隔的复兴医院，而是不得不送到很远的医院治疗。王伯不埋怨，也不求人。王伯去世之后，他生活很寂寞。没想到有一天他到院外马路散步，被一辆三轮车撞伤，从此身体每况愈下。那个骑三轮车的入逃之夭夭。

再后来，王伯又查出胃癌。1998年7月他为我母校题字时曾对我说：“还有许多事情没做完，再给我五年时间就好了！”孰料四个月月后，敬爱的王伯与世长辞！

前些年读黄永年先生的《树新义室书话》(未出出版社，2016年9月)，就期待看到他老先生的藏书目录。黄先生已经故去，没法像他的高足一般亲自张罗，遴选撰写，端赖哲嗣黄寿成先生编成《心太平室古籍书影：黄永年先生收藏精粹》(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1月)，让徘徊门外的爱好者多少窥得一些大师的治学门径、收藏旨趣，自然是我们的幸运。

近日翻检此书，注意到一部日本宽文二年(1662)翻刻的庐陵罗春刊本《颜氏家训》有两则李苦李的题跋，分别是：

《颜氏家训》，宋有沈揆刻本，明有程荣本、辽傅大平本，清有抱经堂卢氏本，近有渭南严式海重刻卢氏本，附补校注，最为详备。此东洋翻刻庐陵罗春本，讹误颇多，然亦旧本也。苦李又记。(下铃“居易堂”白文方印)

“李苦李”这个名字，正是吸引我的原因。书里也将他标注为绍兴近代画家李祯(字晓芙，号苦李)，但他自壮岁入职南通翰墨林印书局，就在这里安家落户，度过了后半生。他是吴昌硕的弟子，陈师曾的好友，王个簃的引路人，艺术成就就不低，在当时的小城里颇有些影响。二十五年后，我曾陪友人去采访他的长女李翼仪，彼时她已九十二岁，但谈吐依然矍铄，令人难忘。还曾蒙她赐以兰石、紫藤之图，全是正宗海派气息。那一时期我还在从事地方党史工作，总是遇到吴天石这个名字。吴天石一九四九年后期担任江苏教育界领导。他是李苦李的女婿、李翼仪的姐夫。

结合“问渠”“居易堂”两枚印章的

甲辰冬月朔

「文汇报」
微信公众号